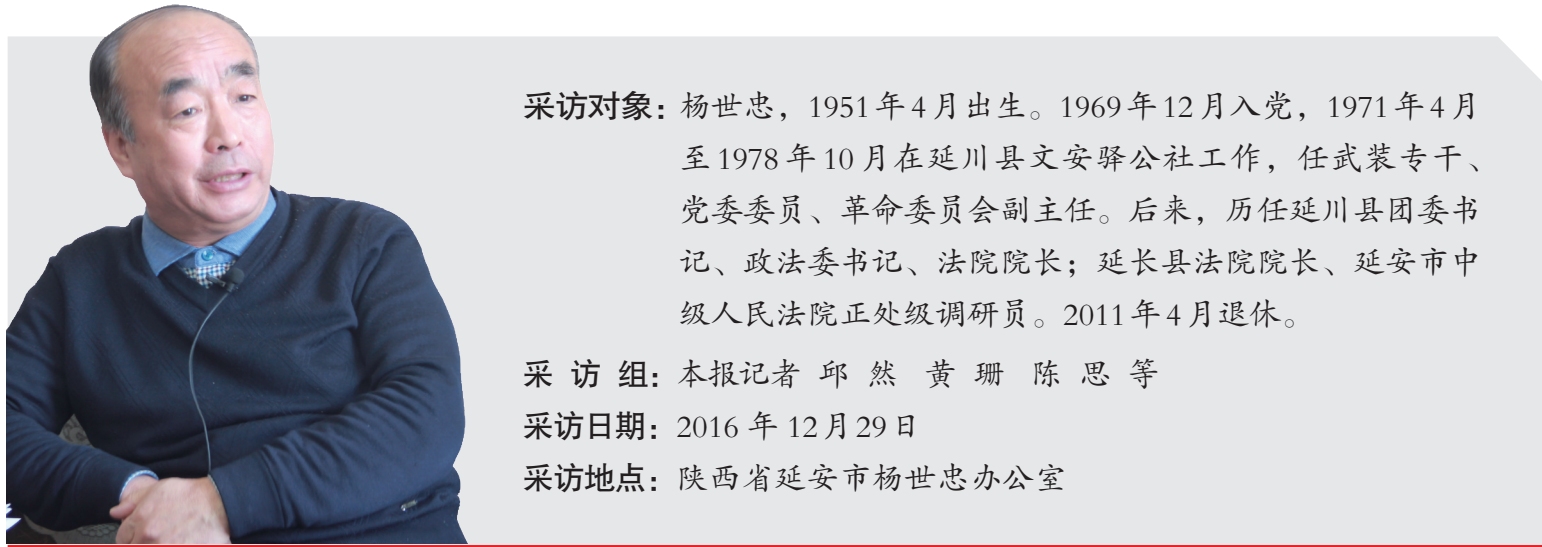


“近平当村支书就是因为大家都拥护他”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对象: 杨世忠，1951年4月出生。1969年12月入党，1971年4月至1978年10月在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工作，任武装专干、党委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历任延川县团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延长县人民法院院长、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处级调研员。2011年4月退休。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 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 陕西省延安市杨世忠办公室

采访组: 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在文安驿公社和他有过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况。

杨世忠: 我是延川县贾家坪人，现在叫贾家坪镇，以前叫贾家坪人民公社。1971年4月，我调到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武装专干。当时，公社的书记、主任是五个人，我是党委委员，排在他们后面，是“六把手”，也算是个小小的公社领导。刘明升同志时任公社团干，在梁家河大队蹲点，我是通过他的介绍认识的近平。

我调到文安驿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知青都已经出去工作了。我的印象中，当时梁家河的知青差不多就只剩下近平和雷平生。我对近平最初的印象，就是感觉到这个十七八岁的后生显得很成熟、稳重，言谈举止、做事为人就像个大人一样，根本不像同龄的有些娃娃那么浮躁、不懂事。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

我比近平大两岁，作为同龄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有亲切感，平时也能聊到一块，也有共同语言。那时，我们年轻干部下乡，工作任务完成后，就想找他们知青一起聊天，不然的话队干部要么就把我们安排到村里的单身老汉家里住，要么就是去队上饲养员住的地方去睡。所以每次我到梁家河大队下乡，都要和近平、雷平生聊天。那个时候他们在村里很孤单，也常来公社谈工作、拉闲话，遇到饭时一起吃个便饭。我们公社干部每月三十斤粮、四两油，每天两顿饭，早上玉米团子炒洋芋丝，下午一般情况吃一顿白面，只要他们一到公社，明升和我谁看见就先给他们报一份面，大家一起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一来一往，慢慢从相互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悉到成为朋友，一起相处了五年。对他那时在梁家河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概况起来就是：一是刻苦学习，二是踏实劳动，三是要求进步，四是心系百姓。

采访组: 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学习

的情况。

杨世忠: 近平一方面是受革命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自己有学习兴趣和上进心，所以他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我第一次到梁家河下乡时，近平已经住到国家拨款修的知青窑洞里了。我发现他的书非常多，桌子上、土炕上摆得到处都是，跟他聊起来，觉得近平还就是有学问，知识面广，对我启发很大。

近平有很多书。据村里人说，他从北京来的时候，就带来沉甸甸的两大箱子书。另外，其他知青去取家里寄来的包裹，里面一般装的是衣服、糖之类的东西，但是近平收到的包裹，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书。

书的种类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哲学、中外的文学作品、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书都有。还有一些工具书。有一次我去他那儿，翻他的汉语辞典，那本辞典很厚，是绿皮的。我说：“哎，这本书好，很实用啊！”近平说：“你觉得好，就拿去用。”就这样，近平送给我一本汉语辞典。这本辞典我一直用了很多年，可惜的是，后来延川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当时近平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很不容易。每天要参加劳动，后来当了村支书就更忙了，但他劳动再苦再累，每天也要抽时间看书，上山劳动的时候也总是带着书，利用生产劳动的间隙时间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一边吃饭一边看书，嘴里吃着饭，眼睛盯着书本。一般的同龄人，很少有他这种刻苦学习精神。我也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各方面学习生活条件比他好得多，却没有近平这么可贵的学习精神。

采访组: 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

杨世忠: 近平当时年纪不大，但是劳动却很吃苦。当他还是普通知青的时候，我们到梁家河去下乡，村里的社员普遍反映：“近平这后生可好了，劳动能吃苦，很忠厚，很踏实，从不溜奸耍滑。他话也少，从

来不会跟人乱开玩笑，也从不骂骂咧咧、打打闹闹。”他人品好，村里老少社员都喜欢到他住的窑里，谈工作、拉家常。

近平无论是当普通知青，还是抽调出去搞社教工作，以及后来当村支书，他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并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候，有些村支书凭着自己手中有点权力，经常借口到这里那里办事的机会，逃避劳动。但近平从来不这么做，在村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他都是按时出工和社员一起劳动。并能带头完成自己每月的劳动任务，从不误工。

采访组: 您当时在文安驿公社任党委委员，对习近平入党过程一定了解的多，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杨世忠: 近平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1973年入了团，1974年1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没有预备期，一批准就正式成为党员。

近平入党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流传很多说法，有些是不严谨的，有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是亲历者之一，整个过程我都比较清楚，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我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讲一下。

当时，我们公社党委书记白光兴思想比较解放。一度，梁家河大队很需要一位有能力的年轻人来当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好好干一些事。那时，原大队书记梁玉明当干部时间也有点长，年龄也有些大，且他主动让贤，多次向公社党委推荐习近平入党，当大队书记。可以说，梁玉明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但当时近平还不是党员，对此，公社党委就把习近平入党问题纳入视野，重点培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公社党委就已经准备接纳近平入党了。

我们公社党委第一次讨论研究近平入党时，虽然大家都认为近平表现好，群众威信高，符合入党条件，一致同意批准他为党员。但为慎重起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当时在洛阳“下放”问题，还需搞个外调比较好。这样我们就落实公社组织干事王学礼联系有

关部门发函外调。没多久，洛阳方面就回了个函，公社党委班子成员都传着看了。函上说：习仲勋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子女升学、就业不受影响。有了这个函，公社就及时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习近平入党，并任命他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近平入党和当支部书记是一个会上研究的。我记得当时会上梁家河大队一起还研究批准了两名党员。

那个时候入党，没有人情关系一说。近平入党，当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积极要求进步、努力工作、受到群众拥护的结果。近平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情和关系可以依靠。他就是个普通的北京知青，千里迢迢到这穷乡僻壤来插队落户。加之，他父亲习仲勋当时还在受政治迫害，没有“解放”，这个情况只会阻碍他入党，对他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近平当时能入党就是因为他完全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并且多次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他能当村支部书记，就是因为他劳动吃苦，群众基础又好，大家都拥护他。

我当时在上文安驿大队蹲点，按公社统一安排，带领广大社员大办沼气，也做出了一些成绩。所以对近平办沼气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近平确实善于思考，也敢想敢干，并自己花钱到四川绵阳考察学习，回来后就在村子里搞了第一个沼气池，也是全县第一口沼气池，引起县沼气办的重视，同时也得到省、地的关注和支持，专门到梁家河大队召开现场会。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大办沼气，一方面解决了社员的照明、做饭、取暖等问题，同时沼气废料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一举多得，有力促进了梁家河大队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深受各级领导一致好评和表扬。

采访组: 习近平“心系百姓”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世忠: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仍然一直关心这里的父老乡亲，今天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

1986年8月，我从地委党校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安驿镇当党委书记，当时近平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1987年元月，我给近平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想到沿海经济发达的厦门市去考察学习，开拓眼见，解放思想。同时也想通过近平把延川的红枣，甘泉的红小豆和我们镇上鹿厂的鹿茸，看能不能通过外贸渠道，寻找一些销路，帮助解决一些资金，促进我镇经济发展。特别是通过考察学习借鉴一些发展思路，学习一些工作经验，为改变我镇面貌作出新贡献。

近平很快就给我回信说：你说要来厦门，感情上我很盼望见到你们，非常欢迎您

们来。但有些事应让你们搞清楚：一个地县的力量到厦门来搞联合，一般来说是不足的，尤其是大跨度的经济合作，难度更大。至今陕西省还没有哪个地市在厦门谈成项目，这涉及到审批权、外汇、资金、交通等问题……

收到回信后，我们对近平恳切邀请非常感激，对他直言相告、有啥说啥的朋友感情表示十分理解。同时我们也作了充分准备，把他在村里带领社员办的沼气池、打的水井、打的坝拍成照片。当年7月，我带领村支部书记梁玉明、供销社主任乔生辉，专门去厦门考察学习。

我们已经多年不见了，到厦门以后，近平见到我们很亲切、非常热情，特别看到那些照片非常高兴和感谢。具体谈到红枣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把红枣运到厦门，确实不太现实，保鲜、运输等成本很高，这种大跨度的经济联合还没有先例。近平说的很实在。

另外就是鹿茸的事情，近平还是很支持的。他联系了几位老板来看，但是一听我们只有三四十只鹿的养殖规模，合作前景不大，都不愿投资，对我启发很大，使我深深认识到“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

当时我们去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那个时候梁家河村还没有通电，照明煤油灯，发展没动力，想通过近平帮我们解决一些拉电资金。后来近平专门给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白崇贵写了封信，引起县委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拨出十万元专款解决了梁家河的拉电问题，对此，梁家河沟的父老乡亲十分感激、念念不忘。

我们在厦门期间，近平白天在单位工作，晚上多次陪我们一起吃饭。我们走的时候，他自己花钱，给我们三个买了飞机票，上飞机那天正下着暴雨，近平冒着大雨把我们送到机场，直到亲眼看着我们上了飞机他才回去，这让我们心里非常感动。

2009年11月13日，近平到延安调研，我也参加了会议。市、县、镇、村四级书记分别汇报工作后，直接点名，“世忠，你讲”，当时我是延长县人民法院院长，我即兴就延安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基本情况、工作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特别是当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的法官队伍青黄不接，办案经费严重不足，以及执行难等问题讲了后，近平非常关注，做了笔记。不久后，最高法院就发来了调研摸底表，存在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和解决。

在那次调研会上，近平当着与会人员的面，回顾说：1973年他在文安驿申请入党期间，从北京寄来了一些“黑材料”，当时“就是明升和世忠把那些材料撕了”，让他顺利入了党。

会议结束后，近平在门口一个一个和大家握手道别，合影留念，我是最后走出会议室的，近平对我说：“世忠，现在就你一个在在职，好好干！”我说：“好！”

（上接1版）

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保持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执着追求，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在做好工作和廉洁自律的全过程。

为什么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首要任务？《准则》鲜明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反面典型，都是信仰缺失、精神迷茫，丧失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腐败分子。有的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薄，对中国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缺乏自信。如果任由这些不良思潮泛滥，我们党将面对执政基础削弱的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共产主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每一名党员在申请入党、面对党旗宣誓的时候，都是在做一个神圣的人生选择，选择了就不能忘记，更不能背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

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准则》对每位党员提出了要求，就是要做到“四个必须”。一是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二是必须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三是必须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四是必须自觉抓好学习。思想理论上的坚定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这里面，首要的就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好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好其中阐明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三）

《准则》与《条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集中统一，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正是从这样的全局高度，《准则》对新形势下如何维护好党中央权威，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提出了清晰的标准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准

则》要求，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我们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政治头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时刻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

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严格执行重大问题报告制度。重大问题报告制度是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就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上下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规管党治党，反复强调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准则》根据新的情况，对重大问题报告制度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要求研究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项或作出重大决定要及时请示报告，执行党中央重要决定的情况要专题报告；遇有突发性重大问题和工作中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除情况紧急必须临机处置并迅速报告外，不准先斩后奏。这就为全党上下维护党中央权威，确定了明确的制度规范。

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切实做到令行禁止。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准则》提出了令行禁止的要求，体现为“三个不准”，

就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体现为“三个决不允许”，指出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要求，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四）

《准则》和《条例》以纪律严明为重要保障，突出强调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如何严明纪律？如何把严明的纪律落到实处？《准则》和《条例》提出了明确要求。

明确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强调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准则》针对党内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方面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着力强调：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

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明确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是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准则》明确提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反对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造成重大损失的，凡因弄虚作假、隐瞒实情骗取荣誉、地位、奖励或其他利益的，凡因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都要依纪依规严肃问责追责。

明确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使纪律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严明纪律，既要靠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纪律观念，靠思想与行动的主动自觉，更要靠严肃的执行与问责。无论是《准则》还是《条例》，都对纪律执行的责任与监督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并对各类党内监督主体在监督执纪方面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我们要对照《准则》和《条例》要求，常抓常管，敢抓敢管，切实担负起执行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的严肃责任。

（作者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